



孽缘

〔英〕D·H·劳伦斯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孽

缘

李
建
译

H 劳伦斯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王馨钵

封面设计:刘梁伟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孽缘

定 价 15.00 元

作 者[英]D·H·劳伦斯

ISBN7-5411-1413-0/1.1340

译 者 李 建

1995 年 11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20,000 册

印张 11.75

字数 28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建设福利印刷工艺厂印刷

内容简介

孽缘

D·H·劳伦斯一向以对传统的价值观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猛烈抨击著称。在本书中,作者又一次以对两性问题大胆的描写和惊世骇俗的探讨,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追求爱情,又不愿成为爱人的奴隶;依恋女人,又不愿成为女人的工具;为了追求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本书主人公笛手阿伦不惜抛弃家庭而混迹于茫茫人海。作者通过此书,广泛地讨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家庭和婚姻的深刻危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在灵与肉两方面的苦闷,并不无偏颇地主张:男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必须超越女人和婚姻的羁绊,甚至不惜以孤独和痛苦为代价。

序 言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从尚在犹豫不定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 1911),到充满自信的最后一篇故事《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 1931)劳伦斯的作品表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和对人自然本性的摧残。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使劳伦斯的作品达到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高峰。

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生在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一个煤矿工人家里,早年当过教师,后来长年过着漂泊的旅行生活,行踪所至,遍及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与墨西哥等地。至1930年3月2日死于法国南部为止,劳伦斯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诗歌,游记,文学评论等,是一位十分多产的作家。

劳伦斯一生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现存秩序的矛盾。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他的家乡诺丁汉一带一边成了浓烟密布的煤矿区,另一边却依然是葱绿青翠的农田森林,象征着工业化社会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之间的对立。随着机器文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濒临全面解体,残余的宗法感情也逐渐消失;森林田野遭到污染毁坏,人越来越沦为机器的附庸。由于人的自然本性受到金钱社会的腐蚀,他已不复是身心统一的完整的人了。劳伦斯认为,文明的发展不应该以扭曲的无

意识的本能和自然的欲望为代价,而人的本能和欲望之中最基本的一项是对性爱的要求。劳伦斯反对对性意识作任何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压抑,无论这种压抑是来自宗教的、道德的、还是经济的。劳伦斯认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大的恶果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破坏;因此,他在阐述他的创作宗旨时说:

我只能写我特别有感触的东西,在目前这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或者调整旧关系,这毕竟是当前面临的问题。^①

这正是劳伦斯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劳伦斯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心理学意义的基点。探索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是劳伦斯作品的普遍题材。试图以实现一种完美的两性关系来摆脱工业化社会对人性的歪曲与压抑,这是劳伦斯《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 1913)、《虹》(The Rainbow, 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 1920)等主要作品的基本主题,然而,这也恰恰是劳伦斯世界观中的根本缺陷。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固然摧残了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但是单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又如何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呢?

《孽缘》(原名:阿伦的杖杆, Aaron's Rod, 1922)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劳伦斯的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对西方民主灰心失望,把欧洲与英国视为地狱,声称“凡是经历了这场战争的人无论谁也不会再绝对相信民主。”劳伦斯在《孽缘》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① 见 Anthonr West: Lawrence(1951), 146 页。

后的思想和情绪：

当我想到我所热爱的那个古老世界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末日感——这种新的世界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孽缘》这部小说气氛与主题扎根于战争年代，但它试图展示的是战后欧洲社会的前景：这个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前奏，倒不如说它是旧世界的末日。从男女关系到饮食起居，一切都在走向腐朽衰败，到处弥漫着一种动荡与没落的感觉。《孽缘》的价值在于它以没有多加隐讳的方式表明了劳伦斯本人在1917年至1921年之间的种种思想观点。

小说的主人公是原先当过矿工的吹笛能手阿伦。他抛下妻儿，在圣诞节前夕弃家出走，因为他不愿再囿于家庭的牢宠，而要追求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如果我再同她（指妻子）或其它人谈情说爱的话，那简直是活受罪。”小说中，这个弃家出走的关键性行动取材于劳伦斯父亲生活的实际情况，此前在别的小说中曾经谈及，但并未深入开掘。阿伦出走之后先后成为修道院乐队和皇家乐团中的笛手。阿伦的笛子，即书中的杖杆，是一管灵巧而悦耳的乐器，它是阿伦离家后赖以谋生的生计，是他艺术才华和个性独立的标志，又是生殖和创造力的象征。阿伦后来在伦敦不幸身染重病，多亏一个叫里立的作家精心照顾，才恢复了健康。在小说后半部，阿伦和里立在意大利再度相逢。阿伦和里立的关系代表了男性之间的友爱；一个男子对另一个具有优越高尚精神力量的男子的顺从，构成了《孽缘》的一个基本主题。

劳伦斯在1920年出版的《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曾经通过男主人公伯金探索过在男子与男子之间建立一种独立关系的可

能性。在《孽缘》一书中，劳伦斯借助里立进一步探索这种关系。里立与阿伦之间这种导师和信徒式的顺从关系贯穿于作品之中，里立是劳伦斯哲学思想的传声筒。里立和阿伦像伯金一样，厌恶狭隘、封闭、排外的家庭关系，反对让婚姻沦为一种占有形式，努力挣脱旧式爱情的枷锁和婚姻的牢笼。里立与妻子争斗不休，阿伦则毅然弃家出走。他们认为要保持男性的独立就须排除女性的爱。阿伦的妻子认为：“作为女人，尤其是作为母亲……她们是生命和存在，也是文明最原始、最伟大的泉源。男人不过是工具和作最后加工的人……这是整个白人世界充实而明确的信念。”（第十三章）。在这个时刻，小说以阿伦的婚姻为例，开始向读者宣教：白人世界的男子接受了这些主张，协力赞同凡是有生产力的、华美的、富有情感和高尚的都属女人；男人试图努力反对这种信念，厌恶他们的妻子，投身青楼妓院或酒肆，企图以此来反对妇女神圣优越这条伟大而可耻的信条。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到头来还是亵渎了他们崇拜的上帝。在他们亵渎女人时，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崇拜她。但是，阿伦不愿对女人顶礼膜拜，男人不应该为女人所羁绊，而要独立自主。劳伦斯这些不顾艺术形式、脱离小说有机结构的说教在小说中多次出现。里立的朋友杰姆以沉溺酒色来恢复战争给他的创伤，里立再三对他叫道：“挺起你的脊梁。要紧的是你的脊梁，你不应该自暴自弃。”（第八章）。甚至还不无侮慢地说：“一个男人到了你的年龄，还要女人的爱，真叫人恶心！”里立对婚姻的厌恶更反映在他与自己妻子的斗争中。他的妻子确信女人的崇高使命与职能，拒绝男子的权威。里立认为这种拒绝权威的行为使世界受到腐蚀，使高贵的种性消失，低贱的人种滋生繁衍（第九章）。劳伦斯思想中受尼采的“超人”哲学观的影响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里立的自救之路在于斗争。他认为世界需要斗争，男人经过斗争才能保持他在婚姻与家庭中的男子汉气概和孤

单的独立性。超越婚姻和女性的羁绊，保持男子的独立性，建立男子与男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劳伦斯在《孽缘》里一再重申的思想。

与男性独立思想并行不悖的是关于所谓“领袖原则”的主题。“关于领袖的原则，劳伦斯思考已久，在《孽缘》中第一次以虚构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① 小说描绘了一群放荡落魄的知识分子聚集伦敦，奢谈革命的暴力和流血，指出战后的社会像一个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外形完好，但内心和神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在这样的环境和这样一群人物中，里立是一个天生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阿伦认为他头脑非凡，能得人心，能效劳于人而不流于卑俗，能统治人而不显得高傲。阿伦相信，服从这样的人物，世界便有复苏的希望。小说中一个人物认为，沉沦的阿伦可在女人的爱与同情之中得到重生，里立对此嗤之以鼻。他鼓吹：

“我们要一个对着一个地站起来，面对一切，打碎旧形式，不让我们的骄傲和生活的勇气被毁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所作为。”

但是这一阵小资产阶级激昂的空喊毫无实际效果，只是在阿伦的心里激起了一阵崇敬：“里立洞察一切，他洞察一切，他的灵魂正抗拒着整个世界。”里立号召阿伦说：“他也需要向一颗更加英武的心屈服，为他献身……。”他鼓吹在摆脱女人、婚姻和传统观念的桎梏之后，女人便会顺从男人，男人便会顺从“一个更伟大的人的英勇的灵魂了。”在这里，男性独立和领袖原则两个思想结合起来，集中表现了劳伦斯当时的哲学观念。英国著名哲学家贝特兰·罗

① Frahk Kermodé: Lawrence (Fontana Collins, 1973), 77 页。

素认为劳伦斯在后期曾经信奉高贵血统和极权领袖,有鼓吹法西斯主义之嫌。这些指责并非全无根据。在《出走的男人》和后期的其他小说如《羽蛇》(The Plumed Serpent, 1926)和《袋鼠》(Kangaroo, 1923)都能找到若干依据。但是,这些想法在劳伦斯整个思维观念中不是主要的部分。他憎恶仇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和西方文明的堕落沉沦,在寻找出路而不可得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离奇的想法,同他此前主张通过性的社会来创造新的文明秩序的主张一样,都是无法实现、不能奏效的谬误思想。劳伦斯是一个小说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他的作品价值在于它艺术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灵魂,而不在于他提出的“匡济世时”的种种药方。

阿伦出走后的寻觅与求索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根象征独立性与创造力的杆杖也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炸得粉碎。笛子的毁灭对阿伦来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他必须从此进入一个更艰巨、更陌生的世界,那里将布满深不可测的屈服与顺从。至于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劳伦斯无法预示,小说结尾所留下的只是一片怀疑与失望。

为使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劳伦斯的创作思想及艺术风格,上海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李建同志在主译了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之后,又译出了《孽缘》和《误入歧途的女人》。我们希望他的这一努力能得到认真的对待,从而使这两部小说的翻译出版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

侯维瑞

一九八八年四月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第一章 蓝色的球

夜幕降临，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闪烁着，大地半冻。这是圣诞前夜。战争已经结束，人们感到如释重负，但似乎又面临着一种新的威胁。人们感到恶梦中的暴力已经消失。那天晚上，在井口出车台的矿工又展开了一场辩论。

阿伦·西森是最后一个乘从煤矿小火车翻过一座小山回家的。他回家晚了，因为他参加了井口出车台上的辩论。他是煤矿矿工协会秘书长，矿工们一大堆无稽之谈使他好不恼火。

他跨过篱笆，越过两片农田，又跨过篱笆，踏上了那条漫长的通向矿工住宅的路。路那端是他的家，那是他自己建造的。他穿过小门，沿着屋墙走到后院。他收住脚步，站在那里，凝视着黑夜笼罩的寒冷的小院。

“爸爸——咱们的爸爸回来了。”一个孩子激动地叫道，随后两个带着围嘴儿的小女孩一下扑到阿伦的脚边。

“爸爸，你能帮我们弄弄圣诞树吗？”两个女孩嚷道。

“我们已经搞到一棵了。”

“不吃饭就弄吗？”他亲热地问道。

“现在就弄，现在就弄——是弗雷德·奥尔顿帮我们搞到的。”

“在哪里？”

小女孩从过道角落拖出一个又粗又黑的东西，一直拖到厨房门前的亮处。

“多好看啊!”米莉森特惊呼道。

“就是,真好看。”玛乔莉应道。

“的确不错。”他说着,跨过横在地上的圣诞树,走到后厨房,把外衣脱下。

“现在就弄,爸爸。现在就弄。”两个小女孩嚷着。

“先帮她们弄吧。晚饭时间早过了,你还是先帮她们弄好再吃吧。”从那间灯火通明的中厅里传来一个女人宏亮的声音。

阿伦·西森已脱去外衣、背心和帽子,光着头,穿着衬衫和背带,站在那儿,凝视着圣诞树。

“怎么弄?”他问道。他把树扶起,抓住最上面的树枝,将树扶直。由于没穿外衣,他站在院子里感到寒风凛冽。他缩了一下双肩。

“它好看极了,是吗!”米莉森特又说。

“是呀!——尽管它歪着。”

“穿些衣服,你们俩。”从厨房里传来了那妇人的尖声命令。

“我们不冷。”两个孩子反抗道。

“快进来穿些衣服。”那声音毫不放松。

阿伦向小路走去,两个女孩唧唧着跑回屋里。天空晴朗,透出一丝暗淡透明的光亮。

阿伦在院子尽头的小屋里翻寻了半天,找出他觉得有用的一把铲子和一个盒子,然后从小屋出来,回到那干净、寒冷、光秃秃的小院。两个女孩飞快地向他奔来,边跑边把帽带系好。冻结的地上放着圣诞树和一个盒子。室外的天空黑沉沉的,寒冷刺骨,犹如电击一般。

“把它扶直。”他对米莉森特说,一面把圣诞树放入盒中。她默不作声地站着,扶着树梢,他在根部周围填土。

填完土,他把土踩实,然后去拿小推车。女孩们兴奋地围着圣

诞树。他放下小推车，蹲下去搬盒子。孩子们看到他忽然缩了一下脸——树枝扎了他一下。

“扎疼了吗？”米莉森特问道。

“唉！”他咕哝着。随后一切都顺利——小推车滚动起来，圣诞树摇晃着，小女孩兴奋极了。他们推到门边，小推车停了下来，阿伦看着盒子。

“你们想把它放在哪儿呢？”他问。

“放在后厨房。”阿伦的妻子大声说道。

“能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吧，总不见得让我到处乱跑。”

“靠着梳妆台吧，爸爸，就放在那儿。”米莉森特建议。

“那么，你过来，在地上铺些报纸。”妈妈急忙说。

两个女孩跑进屋，阿伦略有所思地站在寒风里，轻轻地耸了耸未穿外衣的双肩。从里间敞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地板上铺着一块鲜艳的亚麻地毯，棕色的床头柜边放着一盆蜘蛛抱蛋。

阿伦·西森奋力将盒子搬起。圣诞树又猛扎了一下阿伦的脸。他妻子看着他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脸歪在一边。

“当心，别把地上弄脏了。”她说。

他猛地将盒子放到铺满报纸的地上。泥土撒了一地。

“把泥扫起来。”他对米莉森特说。

阿伦的耳中仍然回荡着树枝着地时突然发出的嘶嘶声。

屋里开着日光灯，里面的一切都显得线条清晰、外观分明和结实耐用。壁炉中炉火正旺。一切都是那么协调、完美。炉边轻轻摇动着的柳条摇篮里，一个婴儿在咿呀学语。孩子的母亲，一位头发漆黑、身材苗条、衣着整洁的妇人正在缝制着小孩的外衣。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站起来，从炉灶里取出丈夫的晚饭。

“今晚你怎么没说话了？”她说。

“是呀。”他答道，到后厨房洗手去了。

几分钟后，他回到屋里，坐下来开始吃饭。房门紧闭，但仍有一股凉风。这是因为房底下放着的煤渣卡住了房门。阿伦移动了一下椅子，想避开这股寒气，但他仍然穿着衬衫和长裤。

他是个英俊的男子，肤色白皙，外貌悦目，年约三十二岁。他话不多，但似乎很有思想。阿伦的妻子又拿起自己的针线活。她对自己的丈夫了如指掌，而阿伦对她却似乎不怎么了解。

“今天矿工们讨论了些什么？”她问道。

“入伙，合伙经营。”

“有结果吗？”

“他们准备试试——如果不理想的话，他们就退出。”

“工友们是不会同意的，我看。”她说，阿伦短笑了一声，继续吃饭。

两个女孩子在圣诞树边的地板上跪着，她俩正从一个木盒里拿出许多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把它们铺了一地。

“一包也别拆。等我们把小包都拿出来再拆。然后，我们轮流拆。这样，我们拆的包就一样多了。”米莉森特说。

“好的，先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玛乔莉赞同道。

“他们想把乔布·阿瑟费里尔怎么样？想让他当头儿吗？”她丈夫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不，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一些人想让他当头儿，但是不是多数，我就知道了。”

她紧紧地盯着他。

“大多数！恐怕会有大多数的。他们想把你除掉，把你当傻瓜，你会伤心死的。告诉我，你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来伤你的心？”

他不出声地笑了笑。

“不，”他说，“我永远不会伤心的。”

“你会走到这一步的，用不了多久：因为那些愚昧无知的矿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蓝色的球	7
第二章 皇家橡树酒家	21
第三章 “火树”	32
第四章 “盐柱”	48
第五章 剧院	55
第六章 海阔天空	69
第七章 黑暗的方花园	80
第八章 饱以老拳	90
第九章 低潮标	106
第十章 又提战争	126
第十一章 再作盐柱	151
第十二章 诺瓦拉	160
第十三章 “过得怎么样?”	186
第十四章 九月二十日	221
第十五章 火车旅行	242
第十六章 佛罗伦萨	258
第十七章 高居教堂广场之上	287
第十八章 侯爵夫人	309
第十九章 美人犹睡 将军何在	329
第二十章 杖杆的破碎	341
第二十一章 语重心长	355

序 言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从尚在犹豫不定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 1911),到充满自信的最后一篇故事《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 1931)劳伦斯的作品表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和对人自然本性的摧残。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使劳伦斯的作品达到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高峰。

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生在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一个煤矿工人家里,早年当过教师,后来长年过着漂泊的旅行生活,行踪所至,遍及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与墨西哥等地。至1930年3月2日死于法国南部为止,劳伦斯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诗歌,游记,文学评论等,是一位十分多产的作家。

劳伦斯一生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现存秩序的矛盾。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他的家乡诺丁汉一带一边成了浓烟密布的煤矿区,另一边却依然是葱绿青翠的农田森林,象征着工业化社会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之间的对立。随着机器文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濒临全面解体,残余的宗法感情也逐渐消失;森林田野遭到污染毁坏,人越来越沦为机器的附庸。由于人的自然本性受到金钱社会的腐蚀,他已不复是身心统一的完整的人了。劳伦斯认为,文明的发展不应该以扭曲的无

意识的本能和自然的欲望为代价，而人的本能和欲望之中最基本的一项是对性爱的要求。劳伦斯反对对性意识作任何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压抑，无论这种压抑是来自宗教的、道德的、还是经济的。劳伦斯认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大的恶果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破坏；因此，他在阐述他的创作宗旨时说：

我只能写我特别有感触的东西，在目前这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或者调整旧关系，这毕竟是当前面临的问题。^①

这正是劳伦斯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劳伦斯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心理学意义的基点。探索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是劳伦斯作品的普遍题材。试图以实现一种完美的两性关系来摆脱工业化社会对人性的歪曲与压抑，这是劳伦斯《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 1913)、《虹》(The Rainbow, 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 1920)等主要作品的基本主题，然而，这也恰恰是劳伦斯世界观中的根本缺陷。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固然摧残了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但是单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又如何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呢？

《孽缘》(原名：阿伦的杖杆，Aaron's Rod, 1922)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劳伦斯的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对西方民主灰心失望，把欧洲与英国视为地狱，声称“凡是经历了这场战争的人无论谁也不会再绝对相信民主。”劳伦斯在《孽缘》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① 见 Anthonr West: Lawrence(1951), 146 页。